



老子《道德经》释译系列丛书

中华国学道德根

熊春锦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老子《道德经》释译系列丛书

中华国学道德根

熊春锦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国学道德根/熊春锦编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8

(老子《德道经》释译系列丛书)

ISBN 7-80109-782-3

I. 中...

II. 熊...

III. 德道经-研究

IV. 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0127 号

中华国学道德根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680×980 毫米 1/16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14.875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熊春锦 先生简介

熊春锦先生，字厚金，号空净，当代国学名家，现任欧洲中国康复养生学院院长、欧洲中华道德文化研究促进会第一主席、新加坡南洋文化发展公司董事长、新加坡人类道德促进会永久名誉主席、世界华人艺术家联合会理事、北京德慧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948年，熊先生出生于湖北麻城一个道学世家，自幼秉承祖上传统道学，继承老子道德根文化系统的哲学思想和圣人之治方法论，并予以不断发扬光大，同时在医、卜、星、相、山等传统五技方面也取得了较深的造诣。

熊先生曾在武汉市硚口区第一医院历任主任医师、副院长、院长等职，《湖北中医》杂志社编委。熊先生从医半世，西医中医并举，曾被选为武汉市区人大代表，市级劳模，并获得医学科技发明奖。凭藉自身对传统道学、道医学的全面继承和办学、讲学的经验，结合现代医学、教育学以及其它社会学科的最新科研成果，对传统国学中培贤育圣的一元四素教育理念，进行发掘、诠释和解析，以万经之王的《道德经》为核心，以一元四素为理论框架，以德慧智教育为灵魂，建立系统的中华德慧智教育理论体系。



图书策划 / 北京德慧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 <http://www.03330.cn>

责任编辑 / 董 巍

书籍装帧 / **莱德设计中心** + 何文
Light 010-86188033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民族复兴有待于道德复兴	(1)
一、治世之道，不离道德	(1)
二、对比分析世界各国的体制结构	(3)
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5)
四、民族国魂是道德，急需复兴扶生	(8)
五、回顾历史看老子《道德经》及其作用	(11)
六、老子《道德经》现实意义	(14)
中华民族根文化和老子社会发展学说（上）	(17)
一、道德复兴是民族根文化复兴的根本	(18)
1. 老子《道德经》就是我们民族根文化的主根	(18)
2. 道德文化是体之于身的学问	(21)
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和思想	(25)
1. 老子按道德之根划分社会发展阶段	(25)
2. 如何理解现代社会处于愚智阶段	(28)
3. 老子社会发展学说的科学性	(29)
4. 社会学说中“以人为本”之本在哪里	(32)
5. 人身体内的道德复兴是社会发展的根基	(37)
中华民族根文化与老子社会发展学说（下）	(42)
三、愚智时代的主要特点	(45)

1. 愚智社会离德必乱的理论分析	(45)
2. 愚智社会的乱后必愚	(49)
3. 愚智社会是仁义礼愚社会的末期	(52)
四、老子社会发展学说思想的意义	(53)
1. 挽救社会危运须求助老子《道德经》	(53)
2. 复兴社会必须从复兴信德起步	(54)
3. 中国道教、佛教曾担负社会道德教化	(61)
五、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对个人修身明德的指导意义	(62)
 论老子“大唯物主义”和“唯德主义”辩证法思想（上）	(66)
一、天人合一的大唯物主义	(67)
1. 什么是老子“大唯物主义”哲学	(67)
2. 老子大唯物主义哲学来自“天人合一”思想	(69)
二、掌握老子哲学思想的方法	(73)
1. 世人为什么难识老子哲学的伟大	(73)
2. 老子“修之身”内求法的方法论	(82)
三、掌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四把钥匙	(86)
1. 象析法释道和德	(88)
2. 数析法释道和德	(92)
3. 理析法释道和德	(100)
4. 炁析法释道和德	(101)
 论老子“大唯物主义”和“唯德主义”辩证法思想（中）	(106)
四、老子的唯德主义辩证法	(106)
1. 老子大唯物主义是现代唯物论哲学的总根	(106)
2. “唯物与唯心”之争融化于“唯德主义”之中	(109)
3. 现代哲学物质第一性理论缺少一半	(112)
4. 德一丢失后的社会混乱状态	(116)
5. 物质与精神的“异相互动双曲线”	(119)

6. 历史德治社会的经验可资借鉴	(125)
7. 马克思主义与老子哲学的结合	(128)
论老子“大唯物主义”和“唯德主义”辩证法思想（下）	(133)
五、阴阳和谐论与矛盾斗争论	(133)
1. “德一”的特殊意义	(133)
2. 阴阳乃“德一”之子	(136)
3. 认清“有”字的真面目	(141)
4. 矛盾斗争论的局限	(147)
5. 阴阳和谐论的内涵与作用	(149)
6. “知守”两个字是把握阴阳的根本方法	(156)
圆融中华圣学，复兴民族道德（上）	
——三生万物是宇宙和社会发展的根本	(162)
一、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泾渭	(162)
1. 现代哲学缺少“修身明德”的哲学基础	(166)
2. 道德学是引领一切的哲学	(168)
二、横贯中外圆融中西的绝学	(172)
1. 老子哲学横贯中西	(172)
2. 西方哲学辩证法来源于东方	(175)
3. 莱布尼茨一念误判导致惨重的后果	(179)
4. 中国人错误地照搬西方哲学	(184)
5. 历史上道德学哲学的丢失	(186)
三、中西宗教特点的异同	(189)
1. 科学和宗教共同构成完整的太极图模式	(189)
2. 德和道是一切事物最核心的本质	(194)
3. 东西方宗教的差异	(197)
4. 以德统驭神权、人欲、王权	(200)

圆融中华圣学，复兴民族道德（下）

——“三生万物中气为和”是和谐发展之道	(205)
一、剖析阴阳知“三”理	(205)
二、明三知三万物昌	(215)
三、知中、识中明和谐	(219)
 主要参考文献	 (226)
编后记	(228)

民族复兴有待于道德复兴

依据老子的学说，详尽地论述了道德是治世的根本和妙方。分析了大唐盛世广泛开展学习老子《德道经》产生实效的历史经验；分析了世界各国的体制结构情况和效果；分析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错误解读，指出宗教是社会“三足鼎立”有效发展结构中的不可缺少的一足。阐明了老子哲学的时代意义。

一、治世之道，不离道德

治世之道，古往今来论著汗牛充栋，归根结蒂，不离道德二字。离则乱，守则安。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就是国魂，是民族立国之本，国魂后面所含的就是国家道德教育（国教）。

近几百年来，自明朝国家教育的“罢黜百家，独尊理学，兴书废经，倡行八股”形成以后，尤其是在外族或者外来的思想入主中原的历史阶段中，中国的道德国魂就逐步丢失。这个丢失可以说是三大块的惨重丢失，一个是外蒙古金国的入侵，主理中原，发生的国魂的丢失，全民尊道贵德的人文文化社会，退缩至观庙之内离尘而存在着，失去了唐宋时代的道德精神进入百姓家的局面。再一个，就是清朝，满人入关以后，使中华加重了道德国魂的丢失。但是，如果详细分析一下，这些都还没有现代丢失得严重。我国近几十年疏忽了中华民族道德传统文化

这个根本，唯以“有之以利”^①的“利”字，制定民族教育方略，忘记了“无之以用”，使整个社会精神领域出现极不乐观的现象，贪毒、黑毒、黄毒泛滥，难以根治。为什么整个社会和民族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离道失德？非常值得深思，需要辨证出其中的病因。

其实这种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祖先们就论证过了。例如，法家的荀子，在当时就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治乱的标准。“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他用“义”、“利”两个字，很简洁地区分治世与乱世：“义”战胜“利”，就是治世；“利”压倒了“义”，就是乱世。他提倡用义德的思想来治理由于“利”产生的乱世。荀子的境界其实还不算太高，离老子的用道德无为治世思想还相去甚远。将仁德、义德、礼德一齐抓住时，才接近老子的哲学思想观，才能实现德治和真正的大治。

老祖宗曾告诉世人和子孙：“不信自然无以明”。这个自“燃”（注：然的本义即燃），就是要教化每个人，用道德将人心点燃，既照亮自己也照亮周围。不做到这一点，每个人的前途就没有光明可言，民族就没有光明可寄，社会就无光明可谈。通过教育而教化民众用道德自燃人心，将私欲人心转化成奉献，这个治心的处方，才是根治一切病根的仙方良药，且万古千秋疗效不变。加强法制的这一观念虽然是必需，但心治是根本，刑治只能是辅助治心的工具，主次要分明。我国历史上，以秦朝为典范，刑治严峻的朝代不可谓不多，但是一旦离开“心治”者，则无一例外地很快地崩溃，史实无情，大道的规律无移，本末倒置有害无益。民族要尽快地在目前这个“人治”的状态中转向为以“德治”为主导以刑治为辅助的状态，才能进入治世的良性循环之中。

当前急需的是将仁、义、礼^②三治尽快展开，全民性地推动道德教

^① 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五章（通行本《道德经》第11章）：“故有之以利，无之以用。”

^② 仁、义、礼：此三者为中华民族传统根文化七字真言“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中心部分，适应于目前社会。“七字真言”是中华民族根文化的灵魂。

育。但是，什么叫仁治？什么叫义治？什么叫礼治？建议专家们将蕴涵中国道德文化精髓的老子《道德经》中所阐释的治国之道深入系统地研究一下，这才对道德治世有益，才能顺利地让民族的道德精神传播和应用于世，而展开其中蕴涵的道德精神的全部内容。高层次的治世，就是用道德精神来治理社会。道德文化是民族的灵魂，道德教育是安邦定国之本。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如果都尊道贵德、遵行道德，就能实现世风和人心的根本治理。大道不行，民众就会心生邪恶，人人为“利”而竞争奔忙，这样只会导致世风日下，而用道德教化百姓，保持民风淳朴，国家就容易长治久安，和平稳定。

二、对比分析世界各国的体制结构

在当代，世界各国密切交融，必然再也不能闭起关来各干各的，世界经济的融合，也推动了世界政治的、甚至宗教的必然联系。然而又不能完全抛开本国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唯物辩证的观点，也是祖先们的中道思想。那么什么是特殊的国情？这一点一定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看，要研究一下胡锦涛主席近期的讲话内容。胡锦涛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提到：“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其它国家不同，对世界上其它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我们不妨放眼观察一下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体制结构状态。

整个西方世界近几个世纪以来，为什么各国都在稳定地向前发展着？经过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每个国家的管理，基本上都是三足鼎立式的框架，政党、宗教、经济三大支柱在法律的基石上共同运转，其中的政党专司国家的执政管理；宗教则专司民众灵魂的教化；经济科技独立发展；政府宏观协调平衡。这种三足鼎立的国家社会管理结构模式，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维护着整个西方世界各

国的稳定和发展。

再以新加坡的国家体制为例考察一下，它是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民情稳定，而且几十年来同样是一党专政。其一党主政不变，但是社会却长期稳定，经济荣而不腐。其中的原因在哪里？考察后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就是对宗教的开放态度。新加坡允许各民族的宗教在法律的基础上各自发展，所留下的空间较为宽松，人民的精神世界有各民族自己的宗教寄托和教化，当政者信与不信也同样沐浴在其中，规范着自己的灵魂，国民的道德精神面貌和素质普遍较高，这才是“高薪”能够养廉的基础。没有精神建设这个基础，再高的薪水也只能养贪育腐。新加坡只是将宗教这一领域放宽，而其它政党和经济科技两大支柱，基本上还是总揽于一体，但是仅仅放了这一根社会支柱，对社会的稳定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知道对这个现象我国的学者是否已经注意到和将意见提出来。我国的道德文化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和经验，道德文化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力远胜于宗教的作用力，道德经典的道德教育对净化人们的心灵，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因此历史上我国的发展对宗教的依赖性，明显地低于整个西方国家对宗教的需求。如何对传统道德文化系统中的经典科学地善加利用，这是值得专家学者们深入探讨的一个大问题。

由于现代哲学思想并未包罗隐显，穿越阴阳，不具备洞穿隐显的理论和方法，没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也就不可能像其它真正的能称之为“经”的思想那样，长期存在而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当前世界上最著名的影响力最大的三部经文：《圣经》、《道德经》、《古兰经》，都具有包罗隐显的特点。这些经文都具有引领民族精神、教化民心的无穷力量。但可惜的是，唯独诞生老子《道德经》的中国并没有运用老子《道德经》来教化民心。民族精神的食神，应当以真正的“经典”饲养，而不应单一化。

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让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和列宁早年关于宗教的论述，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我们的认识误区和导致宗教政策的偏差以及后果是什么？以利我们国家未来有效地治理社会。

马克思 1843 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在这句话之后又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宗教，主要是指西方的基督教，并比作“鸦片”。为什么这样比如呢？1847 年，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说到世界性的大宗教——基督教，写道：“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指出基督教的这一特点不利于当时启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性。

在这里，马克思用“鸦片”这个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但是，在那个时代马克思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基督教的任劳任怨、安分守己的观念就形成了对革命的严重障碍。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清除宗教的影响，所以就有马克思那样的论述，这是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所以马克思就不可能在共产主义运动到来之际，指出基督教还有本质慈善、纯洁心灵的一面。

我们还要注意到马克思对宗教的另一些论述：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马克思还在《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提到“来世的智慧即宗教。”关于宗教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

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马克思眼里，宗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也谈不上必然反动与愚昧，更不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形成现实基础，而每一时期的法律、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观点都构成上层建筑。”即是说，宗教是上层建筑构成的部分之一。我们有必要完整领会马克思的原意，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应与宗教为敌，而应以宗教为镜，找到自己已致力于改革的对象。^①

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来之时，对于俄国的东正教曾与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强烈抵制革命，曾激烈地抨击过宗教，说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等（《列宁全集》第17卷）。列宁这一论述，也是那个革命运动时代的需要，也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特征。

在革命成功后，列宁对宗教又有了新的论述，他提出“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如果有一个祭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们加入社会民主党……”“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恐惧，……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由此可见，列宁对于宗教的理论思考是随着革命斗争的现实逐步调整的，并不总是基于严酷的现实斗争给宗教以消极定义，而是随着形势发展与时俱进。可以想象，如果列宁的寿命长一些，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全过程，他一定会阐发出更新更全面的宗教观。

再来回顾我们中国以道、释为主的宗教情况，中华民族对宗教的依

^① 参见潘岳：《我们应有怎样的宗教观——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赖性是不强的，这种依赖远远低于整个西方各民族，其中的原因就是因
为中华民族具有沉淀数千年之久的、丰富的道德文化。道德文化长期替
代着宗教的作用，是道德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食粮，滋养着整个民族的
精神世界。中华民族的信仰自古都是建立在对道德的信仰之上，汉代以
前没有全民性的宗教，整个民族长期都是自然的道德信仰。本土的道教
诞生于汉末，是建立于全民自然型道德信仰急骤下滑的形势之下。本土
的道教是以继承和传播传统道德文化为宗旨的，这一点又与西方宗教的
本质不同。传入中国的佛教融化于中国的道德文化中，以净化人的心灵
为主要宗旨。道、佛两教都很主持正义，爱护众生，关怀民众疾苦，富
有爱国精神，在历史上抵御倭寇等外来侵略，以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中，都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作出不小的贡献。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
况相结合”的原则，机械地照搬马克思和列宁在他们那个革命时代背
景下对宗教的部分言论，作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来
理解，对宗教的认识论（理论）定格为：宗教是封建、资产阶级反动
派麻醉人民的鸦片，所有宗教团体都是捍卫剥削制度、麻醉人民的机
构。把宗教视为“毒品”，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
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
以此作为我们制订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在这种思想框框指导下把马
克思和列宁对待欧洲基督教和对待俄国东正教的做法，拿来套用在中
国的道佛两教上，这样来制定我们中国的宗教政策，岂不是犯了哲学上
形而上学的错误？

对比二十世纪初列宁对宗教的正确观念和政策的宽松，我们夺取政
权以后，没有认真研究列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提法，对宗教的道德
实质没有透彻的认识，一直局限于“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主
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产生偏差，严重地遏止了宗教以道德纯洁大
众心灵的天然使命。特别以继承和传播道德文化为使命的道教，半个
多世纪来，像受了寒霜的禾苗一样，一蹶不振，这等于砍掉自己以道
德治理社会的臂膀。本土宗教的萎靡不振，又未能及时将传统道德文
化的教育

及时扶生起来，将道德经典的教育接续到民族教育之中，替代宗教的精神教化作用。我们为这个历史性的惨重后果，付出了代价，建国半个世纪以来，使我们的民众和管理者逐步失去了灵魂的纯洁和精神的约束，这是导致近十几年来贪污腐败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民族国魂是道德，急需复兴扶生

当年，面临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上下内外都非常紧张，理论专家们分析研究，想从那个现象中提取教训。可惜，由于没有从根本上透彻全面地深刻分析病因，所以用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这剂药，由于这剂治标的处方基本对症，因而起到了明显的疗效，出现了一个二十年的物质文明复兴时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热浪中，人们都有点飘飘然，以为苏联的教训已经远离我们，问题已经被“开放搞活”彻底解决。但是没有人想到，由于这个处方治标未治本，没有同时抓住用道德医治人的精神灵魂这个根本，一个“利”字，既没有“仁德”的制约，也没有“义德”调控，更没有“礼德”规范，在单纯一个“利”字的推动下，人性中的阴我私心欲望，登峰造极地扩张，“智德”无存。在“利”字面前，人们连最起码的理智都丧失了，“信德”这个做人的根基土地也在欲海的浊浪中飘浮起来，贪污腐败也就必然如洪水一般席卷所有的人心，犯罪率也急剧地攀升，动摇国之根本，物质文明的成果又怎能得到常保呢？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不难看出，道德教育是民族之本，治国之本在治心，在于用道德医治心灵，道德是人类精神的食粮，精神的营养离不开道德。一定要在仁德、义德、礼德这三种德性所构成的道德平台上进行教育和治理，离开这个平台求什么发展都是空，都会昙花一现。这既是历朝历代的教训，也同时是现实世界的深刻教训。

精神这一上层建筑领域，需要以道德经典教育作为精神的食粮，营养人们的精神系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符合人们精神需求的营养哺育主领，让道德经典担负起精神导向作用这一工作，长期放任这种空白，